

张学良并非“西安事变”“主谋”

韩渝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他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兵谏”是谁的主意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

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无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押蒋”的思路发动的。

为放蒋介石大吵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

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

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我个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摘自《延河》

人是不甘心投降的。当时，在受降仪式开始前的一个小时，英军一位指挥官忽然想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不甘投降的感受，于是，他就在军中找了一个会写歌的人，让他立刻创作一首歌曲，唱出英军不愿意投降的心声。

那个会写歌的军人立刻动手，在10多分钟内就创作出名为《颠倒的世界》的歌曲。这首所谓投降歌曲，实际上是用幽默的口气在嘲笑美军。

歌曲创作完成后，英军指挥官先哼唱了一遍，非常满意。于是，指挥官马上开始对7000名投降的英军进行排练。

对于英军的表现，美军在惊异之余，不得不刮目相看。

摘自《羊城晚报》

投降者的歌曲

王吴军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经出现过一首投降者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颠倒的世界》。

当时，经过6年的艰苦战斗，美国终于在独立战争中获胜。1781年，7000名英军向华盛顿领导的美国军队投降。这一年的10月19日，举行了受降仪式。

奇怪的是，向美军投降的英国军队竟然鼓乐阵阵。英军投降的队列在行进中依然步伐整齐，而且还创作

并演唱了一首十分有趣的歌曲——《颠倒的世界》：“如果花朵在蜜蜂的身后嗡嗡直响，如果船都在陆地，如果教堂都在大海上，如果小马都骑着人，如果嫩草都能吞吃母牛，如果猫都被老鼠追得团团转，如果妈妈为了一点钱都把孩子卖给坏人，如果夏天变成了春天，如果春天变成了夏天，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颠倒的世界。”

原来，在美军的强烈攻势下，英军不得不举手投降，但是，大多数军

李鸿章吸烟的排场

贾庆军

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过一个声势浩大且隆重无比的加冕典礼，时间是1896年5月。当时大清帝国曾派出首辅李鸿章前往庆祝。

因为还有中东铁路等事务需要商讨，李鸿章在加冕典礼前两个多星期，即1896年4月18日就抵达了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特意授命总理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全程接待。

在李鸿章之前，维特还没有亲自接待过任何一个中国使节。有人出主意说，中国官场是最讲究规格和排场的，如果场面欠排场或者不隆重，他会觉得很丢面子，认为你不尊重他，小瞧了他，能办的事情也大半会办砸。

维特是沙俄朝臣里温和派的代表，他深谙只有让李鸿章舒心惬意，才能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只有和这

位在大清朝一言九鼎的人物搞好关系，才有利于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以及两国的长期交往。于是维特先是派出宫廷事务部官员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到达敦德萨城后又派出一队士兵专作荣誉护卫。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欢迎仪式当然是盛大隆重的，就连接下来的吃茶点都安排了乐队，组织了歌舞，甚至还有专门的礼宾司仪。

维特对主人的精心安排无疑是满意的。

但这位沙俄总理大臣很快就没了自信。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吸烟细节就把包括维特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俄国人都镇住了。维特写道：

“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声音沙哑，有点像马的嘶叫。立时就有两个中国侍者从隔壁房间飞奔而出，一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一人托着一

史上第一钻石男

宋燕

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如果放在今天，一定是炙手可热、无数女人心向往之的钻石男，他符合现在几乎所有的择偶要求：

出身名门 卫国贵族之后，几世先祖都是士大夫，自己的外祖父还是卫国的大臣。父亲是个商人，家里很有钱。

慷慨多金 除了家里有钱，他自己也非常会赚钱，追随孔子后，不仅孔子一行都靠他资助，自己还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赚钱，终至富可敌国，到后来各国国君都不敢以君臣之礼对待他，而是行宾主之礼。自己有钱还不忘别人，总是资助穷人、赎买奴隶、偷偷给同门兄弟送礼物救穷还不留名，基督山伯爵也没做到他这份儿过。

名校毕业 虽说孔子在当时不招人待见，但毕竟也名动一时且流传千古了，因此子贡怎么也算是名校毕业。而且他在孔子的三千弟子

里排名靠前，被认为得了孔子真传，以至于当后世很多人曾经认为他“贤于孔子”。《论语》里有30多篇都跟他有关，《史记》里他占了一章里1/3的篇幅，在另一章里也有所体现。真是“功”、“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了。

事业有成 由于口才好，又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练就了一身运筹帷幄的本领，他屡屡被各国聘用为重要职务，并在外交方面建立奇功。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走访说服，为一个入玩了5个国家，灭掉了其中一个，并使另一个成就一时霸业。他当时有多成功、多著名？就这么告诉你吧，一个商队只要挂上他的旗帜，就可以在各国间畅行无阻；一个国家只要用他的名义在边境走一圈，就能吓退敌国。

追求进步 就这样一个奇才兼奇财，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伴随在老师身边，不断追求进步，完善自己，总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欧洲墓园多真情

余泽民

在欧洲，我每到一个城市有三个地方必去：咖啡馆、教堂和墓地。

从巴黎向西北开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奥维尔小镇。直通小镇的河滨公路，如今成了一条印象派的朝圣之路，沿途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指示牌，牌子上贴着一幅幅名画的复制品，提醒游人，毕沙罗、塞尚、科罗、梵高等印象派大师当年曾在这里作画。在寂静清冷的奥维尔墓园，在一堵灰色的石墙根下，立着一对矮不过膝的朴素墓碑，棺盖上爬满了绿色藤蔓，从远处看去，两座墓碑像是从一个双人睡袋里钻出的两只脑袋。

他们不是夫妻，而是兄弟，哥哥是梵高，弟弟是提奥。上大学时，我就读了《梵高传》和梵高兄弟的书信集，既激动于哥哥的疯狂灵感，又感动于弟弟的持久亲情。不过，说梵高“只爱艺术，不在乎金钱”并不是事实，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梦想发财，相信自己能够发财，认定自己能举办画展养活自己，并能偿还弟弟为他支付的生活费。梵高在临死前还跟弟弟许诺：“我或者用钱，或者用命来偿还。”最后，梵高用了后者，并且索去了弟弟命。1890年7月29日凌晨，37岁的梵高在奥维尔咽气，6个月后，提奥也撇下家人，安息在哥哥身旁。

在罗马的西班牙台阶东侧，有座两层的“小红房”，那是济慈—雪莱纪念馆。台阶上的游客密密麻麻，可光顾纪念馆的寥寥无几。想来，在崇尚物欲的消费时代，诗人的友谊很难成为主旋律。这两位英国诗人都葬在罗马新教墓地，或许因为他们，当地

人叫它“英国墓地”。

1820年秋，身患肺结核的济慈接到雪莱发自比萨的盛情邀请：“这种病专爱袭击你这样的天才诗人，英国的冬天更会落井下石。朋友，你赶紧搭下一班轮船来意大利找我吧！”济慈离开雾都，几经辗转，11月初才抵达罗马，由于旅途疲惫，他和陪行的好友、画家塞维恩在“小红房”租了套客房暂做修整，结果一病不起。塞维恩心怀惊恐地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并特意借了架钢琴，为濒死的朋友弹海顿的曲子。一个月后济慈病逝，遵旨葬在新教墓地。两年后，雪莱海上遇难，他的尸体虽被火化，但他的心脏被带回罗马，与济慈为邻。

“葬在如此甜蜜的地方，让人爱上死亡。”雪莱生前曾浪漫地说过。

济慈死后56个春秋，那位与他情同手足的英国画家维恩特，也回到罗马与他生死相伴。他俩的墓碑并肩而立，就像长眠奥维尔的梵高兄弟。在两座墓碑中间，还有块很小的石碑，据说是维恩特早夭的孩子。不知为什么，望着这三座墓碑，我忽然感觉自已发现了一个秘密，忽然萌生出一个几乎让自己落泪的莫名念头：这个婴孩并没有死，肯定活在某个只有这对挚友才知晓的无人岛屿……而且，除了他们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孩子是他俩生的。

济慈的碑文是他的遗言：“此地长眠一人，其名以水写成。”在我看来，诗人说的“一人”，就像基督教中“圣三位一体”：诗人、画家、友谊。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友谊，是人类曾经

拥有、却又失去了的美好情感。

在德国图林根州的魏玛古城，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公侯陵。墓地里有一个圆顶教堂，里面安息着一对伟大的友人——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民族剧院门口，这两位“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军人物至今并肩站立，雕像的基座上写着：“诗人伙伴席勒和席勒——祖国”。两人的故居相距很近，步行只要5分钟。

当然，歌德与席勒的友情并非没有遗憾。当时的歌德声名显赫，享尽荣华；席勒则是身陷窘迫，四面楚歌。歌德确实帮过席勒，邀他移居魏玛，帮他买房，资助他写作，并接受席勒的天才激发，创作了《浮士德》的第一卷。用歌德的话说：“我们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不过，歌德在创作上不像席勒那么坦率，似乎总有谨慎的戒心，即使在两人最推心置腹的时候，也不向席勒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

席勒英年早逝，贫寒的妻子把他葬在一个平民的合葬墓穴，以至后人分不清哪个是诗人的头骨。20年后，歌德出于怀念，从墓穴里挖出一堆头骨中挑了一个最大的捧回家，后来把它葬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内。歌德死后，没跟家人葬在一起，而是安息在席勒身边。

雪莱曾在诗中写道：“死亡是这般庄严、安详，如同这静夜温柔无畏；像一个在墓上玩耍的好奇孩童。于是我想，死一定掩盖了诸多神秘，不知人类是否真有美梦存在？”其实诗人是知道的：在真情的墓园，在寂静的地下，藏着人类最神秘的梦——友情。

摘自《特别关注》

太多，根本看不见也不想预见终点。

中年，适时、主动地画上句号。习惯了总结经验，变得稳重谨慎、细心体贴。体会到“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要顾好”。为人处世不再盲目和冲动，感到舒心的“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

老年，处处成引号。繁忙、喧嚣，逐渐离人远去，唯有记忆中的画面依然美好。回忆是一项寂寞的举动，老人盼望多一些与子孙、故人、老伴的言语交流，巴不得说的每句话都有人来听。最担心被忽视、受冷遇，经常向人倾诉“想当年”，哪怕是自言自语。

摘自《广州日报》

你知道行走有多美

黄茨娅

行走，最先是我们生活中一种浅浅的欲望。比如说，儿时的作文，我多想周游世界，遨游太空。

成年的行走是一种强烈的欲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喜欢冲破种种观念，带着希望上路，去远方，去云游，就像台湾已故著名散文家三毛。30岁那年，三毛到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与西班牙人荷西一起生活在迦纳利岛，她记录下了在那里生存的点点滴滴，每一次撒《撒哈拉的故事》，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披着长发、身材高挑的女人像云一样飘游的模样。可以说三毛的一生，做了两件值得回味的。一是写作，二是行走。三毛已远去，但她亲手串起的颗颗行走珍珠，永远闪烁在人们的心中。

很是赏识著名女作家毕淑敏对

于旅游的态度。她曾经说过，环球旅行要趁早。虽然，她自己并没有趁早，而是赶在知天命与花甲之间，带着自己儿子去的。那一次，花掉她40万元稿费。她乘坐日本“和平号”游轮，从日本横滨出发，越过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加勒比海，历时114天，绕地球一周，像唐僧师徒一样，取回来一套行走的真经，《毕淑敏母子航海旅游记》全力推出，反响极大。读过这本旅游书的人，如同品尝一个奇特的香饼，唯有回味无穷。行走是冒险和斗胆的结合。她说乘坐的游轮行进在美国的途中，意外撞了一个洞，游客的心情可想而知。行走的行为到底有多壮美？惊悚过后，毕淑敏收获到一份人生的坦然和从容。“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再不无所谓地消耗一分钟，尽

心尽意做自己喜欢、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花甲之前游世界，扑面而来坦荡心。

暮年的行走其实也很壮美。一位乡下80岁的老太太，一生的愿望是周游世界，可老太太却有严重的晕车病，孝顺的儿子为了实现老家人的愿望，亲手做了一辆自驾车，自己当车夫，只是，自驾车岂能漂洋过海？游不了世界游祖国，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倒也看到了不少秀美的风光，让从未见过世面的老人深感天地之大，山水之美，道路之广，人情之浓。这也是行走，因为他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村庄和城市的生活点滴，给老太太的暮年人生刻下了至深印记。

行走是生命对世界探求的一股心灵律动。它是有力的，也是永恒的。行走的人，不被红尘世事所困，超然物外追赶人生。行走者所留下的足迹，最终会凝聚成一种生命的壮美音符，一种自信，一股勇气，一种精神的仰望。

摘自《思维与智慧》

刘鸣不平，表达劝慰之意，刘禹锡当场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他。刘禹锡胸襟开阔，虽有抑郁不平之心，最终却化为乐观开朗之态。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已成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后来人。

最浪漫凄婉的邂逅篇章，当由崔护来执笔。“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书生崔护在都护南庄遇到的那个面如桃花的女子，到底是谁人，她后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境遇，千年之后，不得而知。然而，故事的浪漫，结局的凄婉，尽在无穷想象之中。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唐朝同病相怜的邂逅。诗人白居易落魄他乡，巧遇一琵琶女，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乐声，那“弦弦掩抑声声思”的愁情，怎不让江州司马泪湿青衫？一曲天涯遇知音，优雅伤怀唱到今。

如今高科技时代，火车飞机相见易，更有网络手机和视频，见面尽在须臾间。多了份快捷，却少了些回味。也许只有在诗页间，走进那苍凉的历史时空，才能觅得一份旷古幽思，感受一番诗意浪漫吧。

摘自《大江晚报》

美文闲读

邂逅在唐朝

梅玉荣

含蕴深远，“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那几分禅机全在这碧山秋云之中了。

最令人感伤的邂逅，是杜甫与李龟年的江南重逢。被藩唐土人评为“少陵七绝，此为压卷”的四句诗，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比李白小11岁，未能像李白那样走运，完全生活在大唐鼎盛时期，而是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昔日繁华时，一个是书生意气的当朝才子，一个是“特承顾遇”的宫廷乐师，而今潦倒中，只是两个苍颜相顾的糟老头子，面对落花，感慨时局，沧桑之感溢于言表。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这四句若作为安史之乱的回忆录，当为题卷之作。

最感交集的邂逅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扬州初逢。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诗相赠，大意是为

含蕴深远，“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那几分禅机全在这碧山秋云之中了。最令人感伤的邂逅，是杜甫与李龟年的江南重逢。被藩唐土人评为“少陵七绝，此为压卷”的四句诗，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比李白小11岁，未能像李白那样走运，完全生活在大唐鼎盛时期，而是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昔日繁华时，一个是书生意气的当朝才子，一个是“特承顾遇”的宫廷乐师，而今潦倒中，只是两个苍颜相顾的糟老头子，面对落花，感慨时局，沧桑之感溢于言表。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这四句若作为安史之乱的回忆录，当为题卷之作。

最感交集的邂逅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扬州初逢。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诗相赠，大意是为